

大修辭觀下視覺語言的修辭認知探討

劉 光 婷

〈摘要〉

修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实现其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该学科在新时期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这是近年来学界对于这一传统学科的重新审视。我们认为，不妨充分利用语言符号的“空间性”特质，去学科外部寻求研究对象，并力求嫁接现有修辭认知图式和新的符号表达体系，最终实现学科间的共同发展。本文拟对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某些视觉传播符号的选取、设计等做出修辭学阐释。

〈关键词〉

大修辭觀；汉语修辭；认知图式；空间性；跨学科

引言

在高校教授《汉语修辭学》已经有些年头了，每年的开学第一课，都会发问：“提及‘修辭’，你会想到什么？”多年来，毫无例外地，同学们都会回答——修辭格。面对这样的答案，我们首先应感到欣慰，这至少说明，自唐钺《修辭格》所发出的“科学的修辭论的先声”影响久远。但是，更多的还是些许失落乃至深深地担忧。

索绪尔以来，现代语言学走过了不同寻常的一个世纪，我们看到了语言学科的百花齐放。可是，通常认为是语言学科一支的修辭学，特别是汉语修辭学，其成长之路为何越走越窄？学界给其贴上了“边缘化”的标签，问题出在哪里呢？

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纷纷重新思考：修辭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实现其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该学科在新时期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担当？学界对于汉语修辭现象的研究也逐渐由微观转向了宏观；由个体话语转向了社会公共话语；由学科内部相对独立的精耕细作转而试图打造学科之间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其中，胡范铸（2002、2003），黎运汉、盛永生（2006），刘亚猛（2009），汪国胜、冯广艺（2009），刘焕辉（2011），高万云（2013），谭学纯（2014、2015）从修辭学的核心概念以及基本问题入手，比较古今中西研究成果，探索了修辭学科的重建问题。张炼强（2015），鹿晓燕、高万云（2017）对修辭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重新讨论，提出了借他山之石、多范式整合、多参数分析和多维度观照等指导思想。陈汝东（2012）、刘光婷（2015）则通过考察汉语修辭思维图式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实例，尝试为修辭学与其他非语言学科的互通互动提供支持。胡范铸、薛笙（2010），陈汝东（2012），刘光婷、李琴（2015），胡范铸、金志军（2016）聚焦于国家形象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参与，强调修辭学应有的社会担当。袁毓林、李新良（2016）以探讨如何使修辭教

学在创新与稳定中求得平衡为出发点，分析了在修辞学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胡范铸（2016）总结式地提出了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为今后的探索指明了很好的方向。

本文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展开的思考。我们拟在反思“‘修辞’是什么”“修辞学应关注什么”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以语言的“空间性”特质作为理论出发点，秉承一种大修辞观，结合当下语言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发散式地谈谈如何拓展当下汉语修辞的研究视野。具体设想是，充分利用语言符号的“空间性”，去学科外部寻求研究对象，并力求嫁接现有修辞认知图式和新的符号表达体系。一方面将会扩大汉语修辞理论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也会对语言学学科外的信息传播行为做出修辞学的解释。不当之处，以就教于方家。

一、“修辞”是什么？

关于“修辞”的所指，胡范铸（2016）认为，修辞学界之内大多避而不谈，修辞学界之外，则在相当程度上被“污名化”。¹⁾既然是重新梳理，不妨全面一些。“修辞”的涵义通常包括修辞活动、修辞规律以及修辞学三个层面，广义的修辞三者皆含，狭义的修辞仅指修辞活动。以上为学界共识，多年来的分歧主要在于：修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活动？从“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適切的一种努力”到“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从“修辞好比美容术”到“从原则上讲，修辞讲的是好不好”，等等，传统修辞观大多认为修辞不过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表达行为罢了。这一认识的局限在于只涉及到修辞研究的经典问题，而远非修辞研究的全貌。胡范铸（2002、2015）先后提出“修辞是追求语言交际有效性的行为”，修辞就是“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行为过程”，在言语行为的框架下，研究促成交际成功的各种因素，极大地丰富了“修辞”的内涵。

我们认为，对于修辞活动，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一种积极的言语表达行为。这种观点在传统修辞学研究阶段较为普遍。如前所述，“美化说”“美容术”等皆是代表。

（2）一种言语“表达+接受”行为。关于修辞活动中所涉及的言语理解的一面，我国自先秦以来就有相关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对修辞理解的认识规律和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名曰“六观论”；至现代，陈望道先生在其《《发凡》和《陈望道修辞论集》两书中论及理解角度的共达50次之多”；²⁾钱钟书先生“构建的理解三原则：‘阐释之循环’‘考辞之始终’‘活参’尤为精彩”。³⁾可是这一传统并未被很好地继承。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才开始了接受修辞学的自觉探索。代表性成果如李军（1996），冯广艺（1998），谭学纯、朱玲（2001）。

（3）一种追求语言交际有效性的行为。把修辞活动看作一种动态行为，交际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都要适切地实现自己的意图，追求行为的有效性。我们比较赞同这种观点。虽说这一认识也非无源之水，比如陈望道先生的“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素”，实则就是在告诉我们实现意图、达成目的的具体办法。但我们认为，动态交际观之所以能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占据主流认识地位，与语用学在我国的引介不无关系。胡范铸（2002）在强调了修辞是追求有效性的特殊言语活动后，又进一步探讨了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结合问题。

综上，我们认为，经典的“修辞”指的是综合利用语音、语汇、语法、语篇、语体、风格等众多要素和手段展开的言语活动，交际双方以实现自我意图、达成交际目的为最终目标。交际活动离不开修辞，修辞贯穿于交际始末，换言之，一切言语行为都是修辞行为。

但是至此，讨论还未结束。我们想补充的，甚至试图重点说明的是：以上所谈论的修辞更准确地应该称之为“言语修辞”。当下，修辞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资利用的媒介符号除语言外，还应包括其他非语言的符号体系，比如音乐、舞蹈、建筑、摄影、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人类的生活图景、文化传统以及文明形态。这一部分不妨称之为“非言语修辞”，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淡化、漠视的。

所以，“修辞”是什么？简言之，它是利用各种符号体系来表达意图、追求信息传递有效性的行为。这种“大修辞”观的树立，也许会带我们走出修辞研究的困境，给未来的探索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修辞学应关注什么？

基于我们试图建立的“大修辞”观，问题来了，修辞学应该关注什么？追根溯源，汉语修辞学诞生并成长于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语境中，和二级学科语言学期“剪不断、理还乱”，此种尴尬境地，促使学界尝试重新为“修辞学”定位。正如刘亚猛（2009）所言，中国修辞研究是“力争有朝一日将自己建设成为类似哲学或语言学那样自成一体的显要学术部门”，还是“毅然放弃对这一地位的全力追求，转而注重将自己建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平台”？但他同时指出，这场围绕着“修辞”这一核心议题进行的多元讨论到底会吸引多少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一个主要条件是他们意识到它与他们各自从事的学术研究具有高度相关性，或者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关系甚大”。⁴⁾我们认为，这段论述可谓精辟。

那么近年来，修辞学科的关注点是否有所变化？我们通过中国修辞学会近三届年会的主题来管窥一下，管窥一下（见表1）：

“作为学科，漠视了社会需要便可能不但意味着这一学科被社会边缘化，还可能意味着学科发展放弃了最强大的推动力。”⁵⁾不难看出，在探索如何继承与发扬传统修辞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当下修辞学科的视野已开阔许多，开始关注一些与国家形象塑造、社会语言生态以及文化传播等相关的宏观问题，相应地涉及新闻、法律、政治、教育、传播等学科领域。这是打造一个开放的修辞学研究平台的良好开端，也是谋求学科发展的积极尝试。概言之，修辞学更关注其社会功用和学术价值，后者将在前者的实现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认为，针对源远流长的修辞研究历程，充分拓展修辞理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非语言学科、非中文语种的运用，是进一步发挥其学术价值、实现社会功用的途径之一。

表 1：中国修辞学会 2012—2016 年学术年会主题一览表

	2012	2014	2016
主题	国家形象·社会发展与修辞学的使命	修辞学·中国话语·社会发展	全球视野·中国话语·修辞研究
分主题	1. 继承与发扬，陈望道学术精神的当代性； 2. 国家形象与城市形象； 3. 修辞与传播的视角； 4. 问题与方法：修辞学研究的新探索； 5. 描写与解释：新闻、法律、广告、政治、教育领域的语体问题新论； 6. 流行与方向：当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1. 修辞理论、方法、现象的新思考； 2. 修辞与中国社会语言生活的现代化； 3. 国家形象修辞学和机构形象修辞学； 4. 话语分析、语体分析、语块分析新论； 5. 当代生活中的流行语研究； 6.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修辞与语用研究； 7. 国外修辞理论、语用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的新进展； 8. 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	1. 全球视野与中国话语建构； 2. 修辞学、语用学视角下的语言生态； 3. 当代修辞学、语用学理论的发展； 4. 当代社会语言运用的新问题与新闻阐释； 5. 修辞、语用与文化传播。

三、语言的空间性对汉语修辞研究的启示

索绪尔曾经指出，语言符号具有线条性，话只能一词一句地在时间轴上展开。其实，线性序列在时间轴上延展的同时也必定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书面表达自不必多说，例如汉字有上下、左右、包围等结构，汉字的书写是在时空的二重维度上同时展开的；口语中，因言语具有物理性，声波的传递也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甘莅豪（2008）认为，语言与空间的关系“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是关注语言叙述的空间，一是关注语言存在的空间。”⁶⁾遗憾的是，前者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后者多年来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修辞领域对语言的空间性存在方式是有过关注的。

汉字修辞方面，早在刘勰《文心雕龙·炼字》篇中就有记载：“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⁷⁾“省联边”“调单复”正是针对汉字的空间视角效果提出的要求。传统的拆字、合字等方法也正是利用了汉字的形体结构。自曹石珠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形貌修辞”这一术语并初步建立起形貌修辞学体系以来，汉字修辞相关问题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刘光婷（2016）讨论了汉字修辞的具体类型——整体借形、结构变形、局部增减形等，并指出，汉字特殊的修辞功用源自其独特的形体特征，空间方块结构即是汉字修辞现象产生的物质基础。

辞格方面，一些辞格的形成亦有其结构上的动因。以回文为例，清代学者朱存孝指出，回文“自苏伯玉妻《盘中诗》为肇端，窦涛妻作《璇玑图》而大备”，⁸⁾《盘中诗》《璇玑图》是将诗词或写在盘中、或织于五色锦缎上而成。其中，空间因素的成诗作用、以及对于后来“回文”辞格的

形成是不容忽视的。“顶真”亦是如此，强调诗句的连环套和、首尾相接。

而语法学界，白丽娜（2006）、王文斌（2013）、邓伟龙（2015）、李心释（2015）、何清强、王文斌（2016a, 2016b）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并对其具体语法表现进行了探讨，甚至还普遍运用到了“空间语法”这一概念，尽管他们的定义并不相同。胡范铸（2016）进一步指出：“作为时间存在的口语和作为空间存在的书面的语言不但在媒介方式上全然不同，同时，在语法结构、语用规则上也一定有种种的差异。……语言的这种空间存在方式到底会给修辞过程带来哪些系统性的差异？”⁹⁾

学理方面，注意到语言符号具有的视觉性特征，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与传播学家杰克斯·都兰德（Jacques Durand）等试图“在视觉成分的运用现象中寻找传统语言学修辞研究中已经基本确定的各种修辞手段”，¹⁰⁾于是便在分析广告图片的基础上开创了“视觉修辞”这一研究领域。

毋庸置疑：首先，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一种空间性存在；其次，对于书面语，语言符号也是一种视觉符号。结合前述，无论是修辞研究的传统，还是近年来语法界对语言空间特质的关注，以及“视觉修辞”理论的支持，问题来了：同样具有空间特质的各类视觉符号能否运用已有的语言修辞思维图式去组织？或者说，这些符号体系的信息表达方式是否已经不自觉地体现出了和语言修辞思维图式相通的一面，我们能否通过修辞学阐释使其更加明朗化？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其实学界在建筑研究领域已有尝试。

布正伟（2000）指出：“建筑语言是人类通过长时间的建筑实践活动创造并总结出来的、用以表达价值观念与审美情感的视觉信息符号系统。”¹¹⁾国外，建筑研究的修辞学视角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本世纪初期以来，修辞学理论开始向建筑领域渗透。成果既有对中国传统建筑词汇修辞、句式修辞、辞格运用的微观阐述；也有对建筑修辞这一全新领域的学科属性、任务及研究方法等的探讨。陈汝东（2011）对建筑的修辞性质、类型、结构、功能以及建筑修辞学的性质、意义等的全面分析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杨瀚、卢俊鹏、梅悦骥（2014）以基本的语法结构作类比，研究了空间组合的思维原型。刘光婷（2015）对北京城市建筑设计、建造过程中的修辞现象进行了梳理，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北京城市建筑的美学特征及其中蕴含的城市的、民族的文化信息。

鉴于此，本文拟继续做出尝试，选取时下国家思考较多的城市形象塑造、传播行为，就其过程中的某些视觉符号表达做出修辞学阐释。

四、城市视觉形象元素传播与汉语修辞思维图式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交流合作上升到交融共生，在这样一个国际语境中，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良好的形象示之全球。周毅（2016）指出，“城市形象是城市的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社会经济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城市形象传播最直观的部分是城市视觉形象元素的传播。”¹²⁾日常中，城市的建筑、景观、甚至市树、市花的选择都在参与建构城市理念、打

造城市灵魂。比如我们会利用车站广场、地铁通道、建筑外墙等公共空间，融入城市文化元素进行各式涂鸦，宣传城市内涵。

而特殊事件中的特定表达对于城市形象的塑造、传播更具影响力。近年来，我国在经济、体育、文化等领域承办过多场世界级盛会，其中会议标识、吉祥物的设计、选择堪称一大亮点。我们将列举几个案例，探究一下这些视觉符号背后蕴含的汉语修辞思维图式。

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官方标识的修辞认知阐释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坛标识也一度引起热议。如下图所示：



标识以渐变的黄、蓝两条丝带围绕大雁塔组合而成。首先，黄、蓝色彩的选择是一种象征。黄丝带与土地同色，象征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色调；蓝丝带既代表海上丝绸之路，也折射出“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圆融包容之心态。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象征”的归属问题，因谈及的是思维图式，我们认为，无论将“象征”归为文艺创作手法还是修辞格，无论借助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载体来表达象征义，其思维图式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借助两类事物共通的某种特征，建立起思维关联，用一种事物来隐喻另一种事物。如上图，通过色彩特征将丝带与土地、大海相关联，用高度抽象的艺术形象言简意丰地传递出某种特定概念。我们认为，符号传递信息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一个象征的行为，只是象征义的赋予因文化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可将“象征”看作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图式，修辞行为更是离不开它。

陆地与海洋环绕成一个球形，黄、蓝双色丝带的空间造型，可以看作是“回环”辞格的运用，蝉联往复，节奏流畅，表明全球民心相通、合作共生。

而丝带中央的大雁塔，则是运用了以特征代本体的“借代”辞格模式，借这一历史建筑，体现出西安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同时，也代指中国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书写新的辉煌。

2. 中国杭州 G20 峰会标识的修辞认知阐释

2016年，G20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首脑峰会。下图为峰会标识：



杭州 G20 峰会标识，用 20 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设计者称，杭州素有“千桥之城”的

美称，选择“桥”这样一个特有视觉文化符号，同时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寓意着 G20 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与倒影的组合方式，很好地运用了“对偶”的修辞图式，一种和谐的均衡之美映入眼帘，同时巧妙地在标识中央打造出一个“O”形空白，既象征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留白。桥梁则由线条构成，形似光纤，20 根线条依次“排比”，铺就了一座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之桥，气势厚重。最后，篆刻隶书“中国”印章不仅中国风十足，同时，印章代表信用，标识将“诚信”这一品质具象化、视觉化，君子言而有信，一个有担当的中国形象被很好地诠释出来了。

3. 上海世界博览会吉祥物的修辞认知阐释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吉祥物海宝，取意“四海之宝”，主体为蓝色“人”字造型。在国际大型活动的吉祥物设计中使用文字，这是一次创新。“人”字互相支撑的结构揭示了美好生活要靠你我共创的理念。只有全世界的“人”相互支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这样的城市才会让生活更加美好。



其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设计也运用过相似的思路。如下图所示：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中国特色、北京特点和奥林匹克运动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篆书“京”字化身一个奔跑冲刺的运动员，又如一个载舞之人欢迎奥运会的召开，既表明了奥运会的举办地是北京，同时又极富中国味道。这也是汉字修辞的一个成功案例。还有我们最初拟申办的 2000 年奥运会，当时的会徽如下图所示，也是将“北京”二字与天坛的建筑形貌完美统一，设计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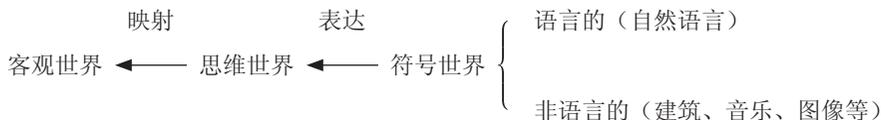
2022 年北京 - 张家口冬季奥运会的标识正在征集中，期待汉语修辞领域能给予其一定的理论支撑，讲好中国冬奥故事，传播人类体育精神。

当然，上述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笔者也曾研究发现过失败的教训。以建筑修辞领域为例，近

年来，快速城镇化的节奏下，国内许多地方类似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那样的山寨建筑频频问世；同时，模仿福、禄、寿形象的天子大酒店，模仿古钱币的方圆大厦等“象形建筑”也常常出现。这无疑是建筑语言符号对于“仿拟”修辞手法的运用，可由于只是简单地模仿套用，缺乏一定的审美情趣，均遭到广大网民的无情吐槽。

五、结语

传递信息时，人类的认知规律是一支潜在的指挥棒，它会将不同的符号体系按照特定的思维图式进行有效编排，我们认为，这是语言符号修辞得以与其他研究领域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如图所示：



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符号，都是对思维世界的一种表达，而这一表达又是对客观世界的映射。这种映射是平面镜式的，还是棱镜式的，学界尚在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映射形成若干图式，并最终指导符号的编码。所以，回到汉语修辞，辞格往往具有特征明显的思维图式，我们所调的语言的空间性特征在辞格中的体现，可以图解如下：

1. 对偶：均衡之美，宛如临镜；



2. 排比：气势之壮，宛如排山；



3. 回环：蝉联往复，丝丝入扣；



我们可以用各种符号体系去填充上面的图式，可以是建筑、摄影、美术、音乐、舞蹈、雕塑等等，当然这只是一些具象的符号，还可以是宏观层面的。

前不久上映的影片《降临》将语言学家、语言研究从幕后送到了台前，一时间，引起众人广泛议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可能也承载着一个预言——不久的将来，语言研究对于社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维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外星人的语言，不是边想边说，而是想好后一股脑儿“喷射”而出。露易丝梳理出的词表中，单词都是一个个弧形的片段，而当

“Human”用作独词句时，它也被拉长形成一个闭环。这也许是对未来语言时间性特质淡化、空间性特质增强的一种大胆想象吧。

盖伊（2014）指出，为什么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因为你说的不一样。语言的习惯造就了思维的习惯，可以设想，线条性语言导致我们记录世界的方式是时间性、因果性的，非线条性的、空间性的语言又会导致怎样的思维习惯？《降临》作为科幻影片为我们做出预测：露易丝具有窥见未来的超能力。她总是恍然看见未来女儿活泼可爱和饱受病痛的样子，还有丈夫的离去。这些幻觉如影随形，使她的生活常常“闪前”，让她分不清现实与未来。

不妨将此片看做是今天的语言学家与未来的对话，而这种对话的深入，展现的不仅是语言的未来，更是社会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修辞学要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利用语言符号的空间性特质去学科外部寻求研究对象，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里的“空间性”是指语言的“空间存在特征”，把言语表达行为放在一个立体空间中去重新审视，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注

- 1) 胡范铸：《理论与现象：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上）》，《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2期，第2页。
- 2)、3) 黎运汉，盛永生：《关于汉语修辞学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9页。
- 4) 刘亚猛：《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及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模式》，《修辞学习》2009年第6期，第22页。
- 5) 胡范铸：《语法研究的修辞性：中国现代语法学史的另一种考察》，《修辞学习》2007年第2期，第13页。
- 6) 甘莅豪：《空间动因作用下的对举结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43页。
- 7)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239页。
- 8)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195页。
- 9) 胡范铸：《理论与现象：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五十个问题（下）》，《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3期，第17页。
- 10) 冯丙奇：《视觉修辞理论的开创——巴特与都兰德广告视觉修辞研究初探》，《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3页。
- 11) 布正伟：《建筑语言的原生属性与特征》，《新建筑》2000年第3期，第21页。
- 12) 周毅：《荷花画图像模式与杭州城市形象传播》，《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72页。

参考文献

- 白丽娜：《空间因素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
- 陈汝东：《论建筑修辞学》，《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邓伟龙：《璇玑中的玄机：汉语及其语法的空间性》，《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 高万云：《中国修辞学的学科重建和科学再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何清强，王文斌：《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英汉名动关系多视角探析》，《现代外语》2016年第4期。
- 胡范铸，胡亦名：《“印象”何以东方：〈敦煌印象〉中的时间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 胡范铸，金志军：《“公关语言”研究：“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探索的先声》，《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6期。
- 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 胡范铸：《“修辞”是什么？“修辞学”是什么？》，《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
- 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
- 胡范铸：《幽默语言、谎言、法律语言、机构形象修辞、实验修辞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新言语行为分析”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黎运汉，盛永生：《关于汉语修辞学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平顶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 李军：《对修辞学研究视角的思考》，《修辞学习》1996年第4期。
- 刘光婷，李琴：《修辞立其诚——当前中国语言生活之圭臬》，《汉字文化》2015年第4期。
- 刘光婷：《修辞学视角下的北京城市建筑语言考察》，《北京文化形态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5年。
- 刘焕辉：《中国修辞学的历史源流与新世纪多元取向的思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 刘亚猛：《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范式转换及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模式》，《修辞学习》2009年第6期。
- 鹿晓燕，高万云：《修辞学研究方法论之变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谭学纯：《融入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思》，《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2期。
- 谭学纯：《中国修辞学：学科之问和学术之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 汪国胜，冯广艺：《新时期的汉语修辞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 王文斌：《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 杨瀚，卢俊鹏，梅悦骥：《建筑空间的语法结构》，《华中建筑》2014年第7期。
- 袁毓林，李新良：《当前修辞学教学的若干问题》，《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4期。
- 张炼强：《略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方法论》，《焦作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郑子瑜，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盖伊·多伊彻：《话镜》，王童鹤、杨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